

浙江文叢

譚獻集

〔上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譚獻集

〔上册〕

〔清〕譚獻著
羅仲鼎 俞浣萍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譚獻集 / (清)譚獻著; 羅仲鼎點校. — 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2. 7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80715-908-7

I. ①譚… II. ①譚… ②羅… III. ①詩詞—作品集
—中國—清代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
①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153437 號

本書由全國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

譚獻集

[清]譚獻 著 羅仲鼎 俞浣萍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況正兵 李 林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45.75

字 數 460 千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908-7

定 價 230.00 圓(精裝)

ISBN 978-7-80715-908-7



9 787807 159087 >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前言

譚獻是清代同光年間負有盛名的學者、詩人，尤以詞學貢獻最爲突出。他是常州詞派的殿後人物，被尊爲一代宗師，繼往開來，影響深遠。

譚獻原名廷獻（一作獻綸），字滌生，後改字仲修，號復堂，晚年自號半厂居士，浙江仁和人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生于清宣宗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，卒于清德宗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，享年七十。

譚獻生活的年代，正是清王朝由盛轉衰並逐漸走向沒落崩潰的時期。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英軍入侵開始，中國近代史上翻開了耻辱的一頁。這一年譚獻八歲。不久以後，就是一八五一年的春天，爆發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、範圍最廣、歷時最久的農民起義運動——太平天國運動，二十餘年間，戰火燃遍了大半個中國。譚獻的整個青壯年時代，都是在充滿戰爭與殺戮的黑暗社會中度過的，他後來在回憶這段生活經歷時沉痛地寫道：『余五十以前，遭遇之困，鮮民之痛，不死于窮餓，不沒于賊（指太平天國戰亂），不溺于海，幸耳幸耳！』〔一〕

譚獻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士人家庭，父親早逝，所以他自稱『予早孤露，襁褓失怙』，是由母親陳宜人撫養長大的。由於家境貧寒，『無從師之束脩』，幾乎中途廢學，後來依靠父輩朋友的

幫助，『招予讀書其家，飲食教誨之』，纔得以完成學業。他深知這樣的機會來之不易，因而刻苦自礪，奮發上進，才能逐漸顯露，爲前輩學人所賞識。『十五歲，就宗文義塾讀書，補弟子員。十六歲乃爲童子師。』不過當時私塾老師收入相當微薄，『歲脩脯不及三十緡』，不足以養家餬口，只能依靠他的母親替別人做針線補貼家用，譚獻晚年對其子追敘道：『嘗力竭寒夜操作，龜手流血，予啜泣于旁。汝祖母訓予曰：但汝得成立，讀書識道理，無忘今夕可也，徒悲何益！』^{〔二〕}這種境況，極大地刺痛了年輕譚獻的心靈，同時也激勵他加倍地奮發向上。從此譚獻開始認真『讀有用書』，研究各種學問，從事詩詞寫作，並且廣交各方朋友，爲以後的人仕用世做好準備。但是譚獻的仕進之途卻十分坎坷。太平軍起事那年，譚獻十九歲，腐敗的清軍綠營兵不堪一擊，太平軍勢如破竹，連克重鎮，不久建都南京，而譚獻的故鄉杭州亦于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和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）兩度被太平軍攻陷，史載當時屠戮慘烈，他的母親陳宜人也在破城後『殉難』。此時譚獻正避地福建，爲學使徐樹藩幕僚，他的妻子從家鄉浮海來到，並帶來了母親不幸遇難的消息。譚獻痛不欲生，說：『烏呼，吾自此不得爲人子，遂不足爲人，已絕于天，死于心也已！』^{〔三〕}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三月，清軍收復杭州，譚獻歷盡千辛萬苦，攜眷回到家鄉，這時他已過而立之年，萬念俱灰。時任杭州太守的全椒人薛時雨與譚獻是舊識，對譚的才能非常欣賞，鼓勵他繼續應舉。但是事與願違，接踵而來的是一次又一次『秋闈報罷』。同治丙寅（一八六六），馬新貽任浙江巡撫，重視戰亂後的文化重建，開辦誥經精舍

書院與刻書局，譚獻被聘爲總校，並參與編纂《忠義錄》。同治六年（一八六七），譚獻終於考取舉人，此時他已經三十六歲了。以後他又多次入京參加會試，但不幸又一次次『下第南還』。譚獻最後一次參加會試失敗，是在同治甲戌（一八七四），這年他已經四十三歲，『自顧漸老』，決定放棄應舉。可能是爲了家庭生計，同時也心有不甘，『欲以民事自試』，稍稍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，便向親朋告貸，入貲到安徽擔任地方官員，並於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歲末到達安慶。先在巡撫衙門做了兩年多的幕僚，後于光緒丁丑（一八七七）八月，出任歙縣縣令，己卯（一八七九）七月，調全椒令，辛巳（一八八一）九月奉命代理懷寧令，三年後移治合肥，兩年後又調宿松縣令，這時譚獻已經五十四歲了。一年以後他因病辭官歸里，但是，回到故鄉以後卻『無以爲家，賃廡轉徙，不遑安處』，無奈只得『擬再赴含山令』。不料就在赴任途中，突然疾病發作，于是只好再次『具牘請開缺』，辭官回到杭州，過著『山林騰笑，挂冠遺履，尋詩書之夙好』的自由自在生活。光緒庚寅（一八九〇），譚獻往日的座主，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，在都會江夏（今武漢市）開辦經心書院，聘請譚獻擔任書院院長，年近六十的譚獻欣然赴命。在擔任書院院長期間，他得以會見許多老友，結交新朋，培養了一批新才，還有時間從事學術研究和詩詞創作，衣食無憂，學術有成，心情非常愉快。他後來回憶這段生活時說：『愉快過于人世榮遇。』^{〔四〕}不過，衰年多病，獨客他鄉，終非長久之計。兩年以後，他終於舉家回到故鄉杭州，與一批老友徜徉湖山，吟詩作賦，研討學術，整理舊稿，直至七十歲去世。

中國古代向有『三不朽』之說，即所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這是千百年來士人們孜孜追求的理想。立德尚已，『唯聖人能爲』，一般人只可仰望。其次是立功，自從隋唐推行科舉制度以來，遂成爲衆多士人追逐的主要目標，應試——入仕——經世致用，是士人們最現實的人生追求。然而這是一條崎嶇險峻的道路，且不論入仕以後的宦海風波，即便要通過這條畏途，也總是成功者寥寥，失敗者多多。這種情況堆積起了中國古代詩歌史上一個恒常的主題——懷才不遇。千百年來，綿綿不絕。譚獻晚年曾作《亡友傳》和《七友傳》，傳主都是他的同學、同鄉，這些人大多是科舉屢北，窮途落魄的貧寒之士，雖然才能傑出，但是由于『無門戶以招致，無綰紆以結歡』^{〔五〕}，他們或死于窮餓，或死于戰亂，或坎坷以終生，或悵鬱而夭折，其中包括莊棫、龔公襄、蔣坦這樣的優秀學者文人。作者通過這些文章，除哀悼友人的不幸命運之外，也對當時扼殺人才的黑暗社會提出了悲憤的控訴。與亡友們相比較，譚獻還是相對幸運的，雖然同樣的懷才不遇，同樣的命運坎坷，他至少還獲取了舉人的資格，出任過十多年的地方官員，並且數度受聘爲書院和書局的院長或總監。他享有高壽，晚年儼然文壇領袖，宏農學派山斗，不僅在生前編輯出版了自己的詩文集《復堂類集》，選本《篋中詞》，還能爲已經亡故的師友整理遺稿，撰寫序言，刻印面世，庶使其不至埋沒于蒿萊。不過對於志存高遠的譚獻而言，內心依舊充滿遺憾，他晚年感歎道：『人貲以縣尹官皖，非素心也。』又說：『蕉萃一第，既無期望之人，塵土一官，何與顯揚之志？』^{〔六〕}顯然，譚獻對自己的仕進立功成就，是非常不滿意的，《復堂類

集》中某些頌揚達官顯宦功業的文章，藝術上雖不見精彩，而敬仰艷羨之情卻溢于言表，此中也反映出作者的內心世界。

二

也許正是譚獻『立功』的失敗和遺憾，促使他在『立言以垂世』方面更加奮發努力。有清一代，學術研究風氣極盛，由于文化重心的南移，江浙一帶，逐漸成為學術文化的重鎮，自明末清初以來，接連湧現了一批學術大師和文壇領袖人物。在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下，譚獻青年時代就在準備應舉的同時，開始了認真刻苦的學術研究，孜孜不倦，終其一生。據他的弟子胡念修說：『先生自咸豐庚申（一八六〇）以後，歷劫亂離，家無長物。薄宦廿年，廉泉湛然，而聚書獨數萬卷，世推善本。讀書亦如之，丹鉛寒暑不去手。著書稱是，積几以數尺計。』^{〔七〕}足見其對學術研究的專注與癡迷。我們從現存《復堂日記》中大量讀書論藝的記載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一點。

與當時許多學者一樣，譚獻學術研究的領域相當廣泛，治學注重經世致用。他從傳統儒家的經典入手，以小學為根柢，旁及史學、哲學、金石書法、版本目錄，甚至還涉及政治經濟等等，他的論文《衡言》就對大亂之後朝廷圖謀恢復的政治經濟方針政策，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批評建議。譚獻《精研丙部》，尤其對《淮南子》和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兩書，『致力為最深』，達

到了極高的學術水平。胡念修認為：『其中鑒別獨得之處，直發千餘年來讀者未泄之秘。』甚至超越了全祖望的《水經注校》與戴望的《管子校正》。當然，這只是一家之論。不過譚獻自己對這兩部投注了畢生心血的著作也確實十分珍視，晚年曾感歎道：『吾老矣，恐不獲親見二書刊成行世矣！』^{〔八〕}透露出深深的悲哀和無奈。此話也不幸而言中，這兩種著作在作者生前均未能『刊成行世』，前者則已被深埋于歷史的積塵之下，這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損失。

譚獻生前曾多次刊印自己的詩文集。二十歲時就與友人一起刊印了《化書堂集》。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），時正當戰亂，他還不到三十歲，在福建學使徐樹藩衙門擔任幕僚，又刊印了《復堂詩》三卷，《復堂詞》一卷，不久『纂錄本朝人所著，成《篋中詞》五卷《續》一卷，刻行。』光緒己酉（一八七九），『乃自定《復堂類集》，凡文四卷、詩九卷、詞二卷，付杭州書局刻之』。儘管如此，據譚獻弟子胡念修說，他的著述『已刊者十不逮一』，真可謂是著作等身了。這種情況，充分表明了譚獻對於『立言』的重視。

《復堂類集》共收錄文四卷，晚年又自定《復堂文續》五卷，篇幅更多于《類集》，可惜《文續》『刻甫過半，先生已歸道山』。不能不說這又是一大遺憾。復堂的文章涉及面很廣，內容比較龐雜，大體說來可分為如下幾個方面：一是模擬漢賦的作品，如《明堂賦》上下篇，內容和形式創新不多，徒然堆砌辭藻典故，與枚、馬相較，恐不免學步之譏；至于模仿六朝駢賦的作品，如《臨安懷古賦》、《定香亭賦》等，往往辭過于情，缺乏獨創之意，正如作者晚年自己所批

評的：『從駢儷人，不能擺落華藻，無所謂潔靜精微也。』^{〔九〕}與他欽佩的前輩作家汪容甫相比，恐怕尚隔一塵。第二類是碑傳，內容主要涉及頌揚循吏的政績，善人的義舉以及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殉難官員的『壯烈』精神，例如《類集》中的《浙江忠義祠碑銘》、《朱聯華傳》、《廈門義學記》、《全椒崇善堂記》以及《文續》中的《許府君家傳》、《戴文節公墓表》等等，都是這類作品，其中有些觀點雖然未必正確，但內容豐富，描寫生動，作為歷史文獻，也可供現代研究者參考。在碑傳類作品中，還有不少所謂節婦傳、孝女傳，傳主有的確實表現了古代婦女的高尚品德，但有些篇章以讚揚的筆調，歌頌了某些有乖常理的愚忠愚孝行為，如割肉療夫、未嫁守節等等，這固然是時代的局限，但也反映了作者的保守思想。第三類可稱為單篇的學術論文和劄記，內容涉及歷史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字、音韻、訓詁、戲劇、碑帖、版本、目錄等方方面面，時有真知灼見，但由於不成系統，難成一家之言。他晚年自我批評說：『吾所學最雜，六經不能上口，諸家師說涉獵及之，輒敢侈談，此過失之大者。』^{〔一〇〕}這一段自白說明譚獻不乏自知之明。作為一個學者，他對自己的要求是很嚴格的。當然由於他的多數學術著作都未能面世，僅憑散見于文集中的單篇論文來評價其學術貢獻，是不全面也是不公正的。在同輩學人中，譚獻年壽較高，位望較隆，他又數度參與刻書局工作，所以在《類集》尤其在《文續》中，保留了大量前人、友人詩文集的序跋，包括他自己所作的論古詩、唐詩、金元詩、明詩以及當代詩歌的文章，為後人研究譚獻的生平思想、藝術主張和文學創作道路，以至清代晚期的文壇狀況、社會文藝

思潮，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。這是復堂文章中的第四類，也是最有意義的一類作品。譚獻晚年解釋爲何自號『半厂居士』時說：『予戊子（一八八八）以來，自號半厂，以爲問學遊迹，仕官文辭，率止于半，以識內愧。』〔二〕滿含著愧疚之情。在《復堂類集自敘》中，他也曾引用陸游的詩表達這種遺憾心情：『文章在眼每森然，力弱才疏挽不前。前輩不生吾輩老，恐留遺恨又千年。』平心而論，譚獻的仕宦學術，也就是『立功』的全部和『立言』的某些部分，確實不算成功，留有許多『遺恨』，但作爲一位詩人、詞人，他卻取得了很大的成績，在文學史上，尤其在近代詞學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，這也許是作者自己始料未及的。

二

韓愈詩《和席八十二韻》有兩句說：『多情懷酒伴，餘事作詩人。』歐陽修解釋說：『嘗以詩爲文章末事。』這種解釋可能是片面的。但是後來正統儒學士人大都贊成歐公的說法，認爲與文章相比，詩歌只是『餘事』，詞則是『詩餘』，更加等而下之。譚獻的觀點與此相反。他恪守傳統儒家的詩教理論，強調詩歌的重要社會地位和教化作用，在《明詩》篇中引用章學誠的話說：『詩教至廣，其用至多。』又說：『一代政教，一時風尚，皆可以觀焉。』他評論詩歌優劣的美學標準是『托體比興，推本性情，規矩《雅頌》』，他認爲詩歌最本質的特點乃是『根柢乎王政，端緒乎人心，章句纂組，蓋其末也』。在這樣的思想觀念指導下，譚獻對詩歌創作傾注了畢生

心血。他從十五歲開始寫詩，三十歲以前就兩次刊印詩集，直至晚年，從不間斷。《復堂類集》共錄詩十一卷，加上後人收輯的《詩續》，總數在千首左右。與此同時，他還非常重視古典詩歌的普及推廣，先後編選過《古詩錄》、《唐詩錄》、《金元詩錄》、《明詩錄》，宣揚自己的詩學主張。可惜這些選本都未能流傳下來。對於宋詩，他是鄙視的，說：『宋詩舛陋，言之不文。』相反，對明代復古派卻大加稱讚：『北地李夢陽，質有其文，始終條理，亦足當少陵之史矣。』^{〔二〕}這無疑是一種偏見，反映了譚獻詩學思想保守的一面。不過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閱歷的加深，作者在創作實踐中逐步改變了自己的觀點，他在《合肥三家詩序》中說：『詩也者，賢人君子不得已而作也，希古樂道與夫觀時感物，如笙磬之同音也。』在《春暉草堂詩序》中又說：『有天寶詩人憂生念亂之遺韻，《離騷》以降，所謂窮而後工者，其在斯乎？』認為詩人不必局限于『希古樂道』的溫柔敦厚之旨，同時也可『觀時感物』，抒發對現實的感慨，進而承認『憂生念亂，窮而後工』是屈原杜甫以來詩歌創作的優良傳統。這一點，從譚獻本人的詩歌作品中也可見出。譚獻早期的詩歌，模擬古人的痕跡比較明顯，缺乏鮮明的個性。中年以後身經戰亂，飽嘗流離顛沛之苦，感受親友別離天亡之痛，目睹黎民生活之艱辛，詩風為之一變。正如他的好友吳懷珍《復堂詩敘》所說：『夫風會所極，詩道亟變，工拙蓋殊焉。而原賢人君子所以作詩之旨，蓋必有天地民物之故，與夫倫類身世升沈新故之感，一旦有觸于外而動于中，遂以宣其纏綿悱惻，煩冤咄咄，不能自己之詞，故優柔善人，惻然動人，使人歌呼悲愉而無以自主，蓋其發于性情之

正，有聲詩以來，未有能有易此者也。』莊中白在《復堂詞後敘》中也說：『大江以南，兵甲未息，仲修不一見其所長，而家國身世之感，未能或釋，觸物有懷，蓋風人之旨也。』同時指出了譚獻後期詩風變化的原因及其詩歌的主要思想藝術特點。

與譚獻的詩歌創作相比較，他在詞學研究和創作方面的成就與貢獻似乎更加突出，更爲時人所看重，對後代的影響也更大。譚獻與好友莊棫同爲清代同光年間兩大詞人，陳廷焯評論說：『余嘗謂近時詞人莊中白尚矣，蔑以加矣，次則譚仲修，鹿潭雖工詞，尚未升《風騷》之堂也。』〔一三〕莊中白早逝，譚獻遂成爲一時的詞壇盟主。這一地位的建立並非偶然，與他的詞學主張、創作成就以及晚年在文壇的位望，都有密切關係。譚獻認爲，詞不僅僅是詩餘，更是古樂府之餘，其源頭上接四始六藝，風雅比興，它由《小雅》發展演變而來。與詩相比，詞還有自身獨特的長處，『其感人也尤捷，無有遠近幽深，風之使來，是故比興之義，升降之故，視詩較著，夫亦在于爲之者矣。』〔一四〕因而在譚獻看來，詞不但不是士人不屑爲的『小道』，而與詩文同樣是『立言以垂不朽』的事業。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引導下，他從青年時代就開始填詞，並對唐宋以來以至當代詞人、詞作及其發展源流變化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。中年以後，他接受了常州詞派的理論觀點，『乃尊信張皋文、周保緒先正之言，銳意爲之。』〔一五〕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，譚獻逐步掌握了詩詞藝術各自的不同規律，『向之未有得于詩者，今遂有得于詞，如是者年至五十，其見始定。』〔一六〕從而使自己的倚聲之作達到了新的藝術高度，占據了當代詞壇的上

游。譚獻並沒有像陳廷焯和況周頤等人那樣，有專門的詞學理論著作，爲了宣揚和貫徹自己的詞學理論主張，他選錄清人詞近千首，加以評點，命名爲《篋中詞》，在譚獻生前刻行。由於『收羅富有，議論正大』（吳梅語），棄取公允，品評精當，加上選評者在詞壇的權威地位，遂爲時人所重，『學者奉爲圭臬』（龍榆生語），對後代也產生了深遠影響。除此之外，他還與當時著名詞人馮煦共同商榷，選定唐宋元明詞家三百四十餘人，共錄詞一千零四十七首，名爲《復堂詞錄》。令人遺憾的是，此書在作者生前及身後均未能刊行，僅有抄本留世，分存於國家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，據云亦已殘缺不全。幸虧譚獻入室弟子徐珂已把其中重要評論，錄入《復堂詞話》，使後人得以窺見《復堂詞錄》的部分面貌。作爲『立言』的一部分，譚獻的詞學成就之所以超過其詩文，還有特定的時代背景。清代被文學史家稱爲詞學復興的時代，倚聲之學在士人中非常普及，幾乎達到人各有詞、詞各有集的程度。在有清二百七十多年中，詞人數量之衆多，詞作風格之多樣，詞派面目之紛繁，都大大超過了前代。雖然清詞的總體成就可能不及兩宋，但是由於士人的大量參與，詞進一步向文人化的方向演變，詞的社會地位和美學品位也得到了很大提高。加之自從詞的曲譜失傳以後，詞喪失了它的音樂功能，已經不再是酒筵歌席上供伶人歌伎們演唱的歌曲，而成爲了供文人寫作的一種特殊的詩體。所以浙派衰落，以張惠言、周濟等人爲代表的常州詞派繼起，大力鼓吹詞並非『小道』，也非『詩之餘』，而是『風騷樂府之遺』，完全可以『言志緣情』，像詩歌一樣表現堂堂正正的社會內容和思想感情。

而且由于格律的特殊性，詞作爲詩的一種補充，還可以表達某些在詩中不宜表達或難以表達的內容，更適合于運用比興寄托的抒情方式，來表現詞人某種幽深曲折的情志，『低回要眇以言其致』，以達到『味之者無極，聞之者動心』的藝術效果。譚獻在《篋中詞》中對張惠言的《水調歌頭》五首給予了最高的評價，說『胸襟學問，醞釀噴薄而出，賦手文心，開倚聲家未有之境』，就是這種詞學觀的表現，而張惠言的這五首詞確實也達到了文人詞的極致，開辟了一種全新的境界。清代自嘉、道以還，浙派式微，常派興起，籠罩詞壇達百年之久，除詞學發展自身的原因之外，還有社會的因素。清王朝在經歷了康、雍、乾三朝的全盛時期以後，封建社會母體所具有的一切弊端開始充分顯露，這座大廈離完全崩坍雖然還有一段時間，但是根基已經朽壞，一遇風雨就搖搖欲墜。『山雨欲來風滿樓』，動蕩的社會呼喚文藝的變革。常州詞派正是應時而生的一個文學流派，他們打著反對『雕琢曼詞』的旗號，主張詞首先要『重意』，繼承風騷樂府的優良傳統，講究比興寄托，抒寫『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之情』。雖然這種主張僅僅是封建社會內部某些士人試圖補弊糾偏、進行改良的主張，與天崩地坼、血雨腥風的社會形勢並不相稱。不過對於蕩滌當時詞壇輕淺萎靡的不良風氣，畢竟還是起過一定作用的。譚獻作爲常州詞派的殿後人物，繼承並發展了常派的理論主張，以自己的創作示範、精到評論，影響當代及後學，遂成爲一代詞學宗師。譚獻『立言』的成就，在詞學方面之所以遠高于其詩文創作，原因大約在于此。正如近人葉恭綽先生所言：『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緒，力尊詞體，上溯風

騷，詞之門庭緣是始廓，遂開近三十年之風尚，論清詞者當在不桃之列。』^{〔一七〕}

四

譚獻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學者和作家，刻苦勤奮，興趣廣泛，著作等身，他生前和身後都有不少作品刊印行世，涉及面也很廣。我們此次整理《譚獻集》，以作者生前親自審定刊行的《復堂類集》爲主，內容包括文、詩、詞三部分。其餘學術著作、詩詞選本，均不包括在內。但是由于《復堂類集》初刻于光緒己卯（一八七九），離作者去世尚有二十餘年，所錄作品不全。譚獻生前還編輯過《復堂文續》五卷，共計一百六十餘篇，內容尚多于《類集》所錄。此書由譚獻親自校訂，但未及完工而作者不幸去世，後由他的弟子胡念修在光緒辛丑（一九〇一）主持刻成面世，收入《刻鵠齋叢書》。此外徐彥寬『手錄得復堂丈未刻詩一帙』^{〔一八〕}，共六十六首，又《復堂諭子書》兩則，一併收入《念劬廬叢刻初編》，刊印行世。浙江圖書館館刊（一九三七年）又收集了《復堂詞續》十三首，這些我們全部予以收錄。譚獻對戲曲也頗有研究，《文續》中有單篇論文《玉獅堂後五種曲敘》，評論劇作家陳叔明的作品。此外還有品評當時戲曲演員的專著《增補菊部群英》（作者化名麋月樓主），由譚獻好友王詒壽題詞。作爲研究戲曲史的有用資料，這次也作爲附錄收入。至于譚獻其他的學術著作，如《董子定本》、《復堂日記》、《復堂詞話》、《合肥三家詩錄》、《漢鏡歌十八曲集解》、《片玉詞考異》以及書法研究著作

《非見齋審定六朝正書碑目》（與魏錫曾合作）等等，都是很有價值的著作，其中有的還是從未面世的稿本，但是限于體例和篇幅，只能割愛。

《復堂類集》在譚獻生前曾經刊印過兩次，第一次刻于光緒己卯（一八七九），共錄文四卷，詩九卷，詞二卷，日記六卷。金石跋及文餘各三卷則注明『未刻』。集前有《自敘》，詩集前有好友《吳懷珍敘》，但此敘作于咸豐甲寅（一八五四），可能就是譚獻在福建刊印《復堂詩》的序言，距《類集》刊印已經二十五年，錄以爲敘大約帶有紀念亡友之意。詞後錄有作者至交莊械的《敘》，此文未注明年月，而莊械也已在《類集》刊印前一年去世。這一版本，與《諭子書》所稱『今年乃盡搜衍，自定《復堂類集》，凡文四卷、詩九卷、詞二卷，付杭州書局刻之』，內容完全相符。第二次刻印于光緒乙酉（一八八五），共錄文四卷，詩十一卷，詞三卷，日記八卷。詩詞分別比『己卯本』多出兩卷和一卷，日記多出兩卷。此書由譚獻親自勘定，並收入由他自己編輯的《半厂叢書》，成爲其中一種。《復堂類集》兩個版本刊印時間雖然相隔六年，但是除了作品內容有所增加之外，版式、文字均無差異，估計第二次刻印所增，是采用拼版方式，以節省成本。

這次整理《譚獻集》，僅限于收錄其詩、文、詞，故以『己卯本』爲底本，另據乙酉《半厂叢書》本增補詩兩卷，詞一卷。再據《刻鵠齋叢書》增補《復堂文續》五卷，又據《念劬廬叢刻初編》增補《復堂詩續》一卷、《復堂諭子書》兩則，據浙江圖書館館刊錄補《復堂詞續》一卷。華